

保护故宫文化遗产，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王旭东

坚持“两创”
铸就辉煌

核心阅读

故宫独特的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彰显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故宫文化遗产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承载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也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

以故宫、莫高窟、长城、大运河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形成发展过程的见证，也揭示出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文化遗产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全面系统深

入阐述，为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脉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文明的见证，对我们更好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紫禁城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之大成，集中体现了自秦汉以来“大一统”的共同心理、“致中和”的哲学思维和严整均衡的礼序传承，以及天人合一、顺势施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观念。收藏其间的186万余件(套)文物藏品，跨越了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以及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连缀成一部不间断的物质文明史，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持续不断又灿烂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同时，各民族文化在此交流交往交融，中华文明在此与世界各文明交流互鉴、相得益彰。故宫独特的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彰显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故宫文化遗产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承载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也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

新时代新征程，故宫博物院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指示为指导，不断加大故宫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力度，稳步推进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和活力故宫建设，努力构建符合故宫实际、引领博物馆和世界旅游景区发展方向的发展体系。故宫博物院将坚持守正创新，更好肩负起真实完整地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全力将这座国际一流的博物馆建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引领者、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

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加强故宫文化遗产保护，要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把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作为贯穿始终的首要任务，“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加强故宫文化遗产保护，要坚持国际标准，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要求，统筹做好文化遗产监测、遗产保护标准化、预防性保护、研究性保护、文物防震及抢救性科技修复保护等工作。加强故宫文化遗产保护，还要以敬畏之

心、珍爱之情、扎实之举，把故宫及其丰富的馆藏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开展古书画保护传承等多学科保护项目，更好地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

深入挖掘故宫文化价值。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故宫注重组织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研究，让故宫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得到完整阐释。从深度参与《(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到组织“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与研究”项目，从“基于故宫文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课题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从“书画保护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到“国家文物局古陶瓷重点科研基地”建设，故宫博物院不断挖掘文化遗产蕴含的中华文化精髓，让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当下，泽被后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更多“源头活水”。

促进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故宫把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运用当代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信息采集、存储、研究与保护、传播，致力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全方位立体覆盖的数字化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故宫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以每年6万至8万件的采集数量，加速馆藏文物基础影像采集，并持续建设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我们推动故宫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开拓创新，建设“故宫·腾讯联合创新实验室”等“文化+科技”合作基地，让数字文化生产与传播向智能化、社交化、服务化的新数字传播形态转变。故宫智慧博物馆通过“故宫博物院”小程序、400观众智能服务热线等，提升服务效能。通过建设大高玄殿数字馆、“数字文物库”和“数字图书馆”，开发《清明上河图3.0》《“纹”以载道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故宫文物承载的多元价值插上数字科技的翅膀，走进千家万户，满足人民群众接触文化、获取知识、提升修养、终身学习的愿望。

激发优秀传统文化活力。故宫立足当代、服务人民，充分挖掘文物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并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从面向普通公

众的系列科普学术讲座，到面向青少年的“故宫小书包”“孩子，圆你故宫梦”等特色公益活动，从故宫里众多优秀展览到在各地巡演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音乐儿童剧《用端》，故宫注重通过多样化形式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守护好紫禁城、保护好珍贵文物的基础上，我们将通过“活力故宫”建设，以更具特色的展览展示、更高水平的宣传推广、更优质便捷的开放服务，让人民获得更充实、更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持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故宫作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见证，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加强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合作，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具有双重意义。故宫将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文化“走出去”，以有内涵、有深度、新颖立体的展览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7月19日，故宫多语种网站发布，覆盖英、法、俄、西、日五种语言国际观众。故宫还将大力支持文化“请进来”，通过开展跨文化文明比较研究，举办“太和论坛”，实施促进中外学者交流的“太和学者计划”，建设国际联合实验室和国际学术论坛，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故宫、莫高窟、长城、大运河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形成发展过程的见证，也揭示出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存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我们要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故宫文化遗产，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遗产保护有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为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

下图为故宫太和殿。 杨澄摄



▲ 珐华贴金镂空罐。秦大树供图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了伊斯兰风格的青花瓷和珐华器，给大航海初期阶段新旧贸易体系博弈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

在广阔的南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沉没着大量古代商船。进入深海获取这些沉船信息，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的当务之急。

要向深海挺进，必须借助深海科技的力量。从2009年至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的首台载人深潜器“蛟龙”号接连取得1000米级、3000米级、5000米级和7000米级海试成功。“奋斗者”号在2020年成功坐底万米深度的马里亚纳海沟，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也标志着我国形成了从1000米、4500米、7000米到万米级的全海深深潜能力，这意味着水下考古“望洋兴叹”的状况有望改变。2018年1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现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科学院深海所)正式成立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吹响了向深海进军号角。

2022年10月，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出海执行科考任务，行进至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水深时，其搭载的测深侧扫设备传回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图像：一座高达3米、由密密麻麻的瓷器堆积而成的“小山”赫然出现在队员眼前。就在该沉船不远处，团队还发现了另一艘沉船，其周围散落着大量原木。考古专家综合研判认为，第一处沉船应属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并将其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推测文物数量超10万件；另一处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应属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应是从海外装载货物驶往中国的古代船只。

一号沉船是在南海和东南亚海域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明代中期的沉船。南海的陆坡地带是硬底，船沉入海底后，船货就摆在了海床表面，受到泥沙干扰很少。一号沉船地的瓷器明显分成几堆展露在海底，说明这些瓷器原来分别存放在不同舱室中。

一号沉船出水器物主要是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青花瓷器元代后期已在景德镇大规模生产，由于元末战乱，景德镇窑业生产受到巨大破坏，加之进口的青花彩料较难获得，明代初年青花瓷仅在御窑生产，民窑则主要生产质量较差的白釉瓷器。直到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年)，青花瓷才开始在民窑作坊生产，技术迅速成熟，质量提高很快，并迅速成为主要的外销瓷器品种。一号沉船出水的青花瓷器中有一些质量很高，胎釉洁白，颜色亮丽，纹样复杂，代表了当时青花瓷制作水平。

一号沉船出水的多彩珐华器最引人注目。珐华器是以稀泥浆通过细管挤在瓷器表面，勾画出突起的图案轮廓，称为沥粉技法，然后再在勾画出的纹样内填上不同颜色的彩，形成边界明晰、色彩鲜艳的纹饰。一号沉船出水的珐华器，颜色鲜艳，还使用了镂空技术。部分器物表面有大片的贴金，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水平。这类器物应该是景德镇民窑为了满足海外需要，专门生产的高档产品。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考古发掘不曾发现。一号沉船出水器物无疑给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寻找这类窑址的动力和目标。

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地点，海床上布满了大量原木。经科技分析，这些木材来自中南半岛。在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主要采用中间港贸易模式。元代中国最重要的中间港是庆元(现在的宁波)，明代开始，中间港逐渐转移到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口地区。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在东南亚培育了一个重要的中间港——满喇加(现在的马六甲)，建立了郑和城堡，成为航海基地。来往船队首先靠泊这里，再分为不同分宗前往印度洋各地。一号沉船出水了伊斯兰风格的青花瓷和珐华器，给大航海初期阶段新旧贸易体系博弈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

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开展的深海考古项目，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深海考古行列。此次发现的两艘沉船不仅出水了精美器物，而且带来新的研究课题，对于加强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贸易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我国深海考古的重要发现

秦大树

运河文化展览重现元大都风采

王子奇

大运河沿线城市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以此为线索策划了多项展览，《大都：元代北京城》是系列展览中的重头戏，来自22家文博单位的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带领观众领略元大都的壮阔和风华。观众如果细心观展，会注意到有许多与书画家赵孟頫相关的展品。通过这些线索，我们可以拼出一个赵孟頫眼中的元大都。

1286年的12月，时年32岁的赵孟頫从湖州出发，再由杭州取道运河北上，水陆交替向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进发。这是赵孟頫第一次北上大都。那时元大都刚刚落成不久。这座展现在赵孟頫眼前的大都城，由外城、皇城、宫城重重相套组成。距离大都很远就能看到它高耸的外城和深远的城壕，大都外城上共开有11座城门，东、西、南三面各三门，北面开两门。700余年后，考古学家又发掘出元大都外城西侧城门和义门的瓮城城门，像是揭开了时光帷幕的一角。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徐莘芳开始主持元大都遗址的考古工作时，元大都遗址



▲ 元代各窑口瓷器组合展出。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供图

已有2/3的面积被遮掩在明清北京城之下，而且被遮掩的部分正是都城的精华所在，已经没有办法把元大都城内中心区域，即宫城、隆福、兴圣三宫和包括琼华岛在内的西

苑以及太庙、社稷坛和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官署等遗址，全部发掘出来。考古学家们将此类城址称为“古今重叠型城址”，并探索出一套复原研究方法。结合这些文

献，徐莘芳曾对元大都城市平面做出系统的复原。在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元大都城市平面复原图。

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工作，我们知道城中排列着一条条笔直开凿的街道和平行分布的胡同，街的两侧还修建有石砌的排水渠，这是城市骨架。这些胡同，不少至今还在。给赵孟頫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城中广阔的水面。刚刚抵达大都，他提笔写下《初至都下即事》。诗中提到的“海子”就是今天北京的积水潭，它向南与皇城中的太液池相连，这里正是元大都的前身金中都城外东北的离宫万宁宫所在。

赵孟頫留在了大都，之后也多次往返于此。从艺术史角度看，赵孟頫是开一代风气的枢轴式人物，展览展出了部分与其相关联的书画家的艺术作品。

在大都城内有更多专供宫廷、内府或者官署使用的瓷器以及具有时代特点的金银器，这些器物通过南船北马汇聚大都。在元大都遗址，来自各地数以万计的瓷片被发掘出土，匆匆掩埋的元代窖藏中还遗留着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在元大都发现的瓷器中以磁州窑、景德镇窑、钧窑、龙泉窑的产品最为丰富。这些被考古学重新赋予生命的器物静静立在展厅，使逝去的历史复活，我们似乎听得见大都城内市井的喧闹、诗人的吟唱，闻得到茶酒的醇香。

(作者为《大都：元代北京城》策展人)